

追念王世慶先生：

記前輩學者最後的身影和遺響

周婉窈

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教授



1月16日晚間，我接到康麗莉女士的來電，得知王世慶先生逝世，一時感到很愕然。康女士是王世慶先生的媳婦，也就是王先生獨子孟亮教授的妻子。康女士說，王孟亮教授此刻在日本，要我代為通知學界友人。可能受此付託，有任務在身，無法多想，於是在忙於聯絡中度過最該感到哀傷的一個夜晚。第二天上午聯絡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之後，下午和我先生陳弱水到醫院的公共靈堂拈香致意，當時只有神主牌，相片還沒掛出來，又促居一角，感覺很寂寥，也就是在那時候，我方才深切感到王先生真正已經離我們而去。

文獻館的同仁希望我寫篇紀念文，熟識王先生的學界朋友很多，他們比我更了解王先生的學術成就，其實輪不到我來寫。我想，如果我有何特別可寫的，那麼，大概是王先生最後幾年吧。即使如此，王先生最後一次擔任論文評論（2010年9月25日），以及最後一次接受採訪（2010年10月8日），我都沒在場，在這裡，我只能從個人的角度出發，更完整的圖象，有待將來了。

王先生是臺灣史前輩學者，和很多學界朋友一樣，我在學生時代就見過他。印象比較深的是，我讀研究所時，有一次在黃富三教授的研究室見到王先生，他提及當時有計畫要將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檔案一一裱褙，對此，他充滿焦慮，擔心此舉會破壞珍貴的史料。我還因此寫了一篇投書。我還在海外撰寫博士論文時，曾返臺參加研討會，王先生擔任一篇論文的評論人，我記得他講話時聲音宏亮，很有條理，要點很清楚。究實而言，在這個階段我和王先生的接觸其實很淺。

1994年11月我進到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工作，王先生是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（社科所）兼任研究員，也是上述籌備處的諮詢委員，於是我們成為廣義的同仁，經常有機會見面。我記得一件有趣的事，當時籌備處沒有場所，我和一、二位同仁「棲身」近史所老舊的研究室，隔音很差，有一天王先生到我隔壁的研究室和翁佳音聊天，我聽到他說：周婉窈到美國留學這麼多年，臺語還會講（iáu ē-hiáu kóng）。雖然隔著一道牆，我感覺王先生的表情是稱許的；我當時暗自好笑，為什麼到美國多年就會變得不會講臺語？後來我了解到，王先生雖然國語表達沒問題，但若場合允許，他比較習慣講臺語。我自知臺

語講不好，在我的成長過程中，通過教育和社化我的母語被置換了。可能由於我還「願意」講臺語，王先生才不吝在背後給予讚揚（即使明顯講不好）。

我和王先生在同個研究機構工作十多年，如果要一一敘述其間的接觸，一定會顯得很瑣碎。在這裡，我想從幾件小事來呈現我所認識的王先生，及其給予我個人的啟示——做人的，以及學問方面的。有一次和日本臺灣文學研究者河原功先生見面，他早在1972年就認識王先生，提及王先生時，河原先生以十分崇敬的口吻說：王先生是「人格者」（jinkaku sha），令我印象深刻極了，也有空谷足音之感。已經好久沒聽到這個用語了，在臺語裡我們說「jîn-keh-chiá」，是對人的最高讚譽。好像小時候聽過後，就再也沒聽過了，沒想到數十年後再度從日本人口中聽到，雖然都是用日語講，意思完全一樣（臺語其實來自日語）。王先生如同他那個世代的許多「老派」人士一樣，守正不阿、敬謹奉公，做事很「頂真」（téng-chin），行事風格，用現在的流行語來說，就是低調到不行。這些特質，凡是和王先生接觸過的人，應該都有此感受。我有幸在王先生最後幾年，因緣際會，和他有比較密切的往來，親炙門庭，見識到前輩學者的風範。

話說從頭，我剛到中研院服務時，王先生烏髮茂密，臉頰略微豐腴，但是他在中研院的最後幾年，健康變化很快，視力衰退，行動逐漸不便。我記得我和幾位同事到過他在樹林的老家探望過幾次，他在樹林的家，是獨門獨院的兩層樓房，庭院不大，但草木扶疏，植有櫻花樹。後來，大概身體越來越不好，就搬到新生南路二段和兒子一家人住，王宅是公寓大樓，馬路對面就是大安森林公園。那是2005年秋天的事。很巧的是，我於2006年秋天離開中研院，轉職到臺灣大學專任，原先借住長興街套房宿舍，翌年抽到溫州街宿舍，靠近和平東路和新生南路，也就成了王先生的鄰居了。由於住得近，要去拜訪王先生就更方便了。

或許意識到學術傳承的重要，每次要拜訪王先生，我總是盡量找學生一起去，讓他們有機會接觸前輩學者。王先生好像也很喜歡學生帶來的活潑氣氛。2007年和2008年，我和學生連續兩年在他的生日，攜帶

蛋糕前往賀壽——查忻打探到的生日實際上差6天，但王先生從來沒指出我們的錯誤，他就是那麼客氣（要我早就講了）。2009年，我到英國劍橋大學給演講，無法安排祝壽；去年生日，王先生已經很難下床走路了，我只和兩位學生陳慧先和許妝莊帶著小蛋糕，擠坐在王先生的床邊，在他親自吹熄蠟燭後，合唱生日快樂歌。今年，只能祝賀冥誕了。

和我去拜訪王先生的學生，從大學生到博班學生都有，有一次是中研院幾位助理，度過一個愉快的下午。王先生學識非常廣博，整個臺灣歷史，不論是具體事物，或是相關史料，好像都存在他的腦海中。他最關心學生的研究題目，只要告訴過他一次，他一定記得。他的記憶力非常好，連學生家鄉哪裡，隔再久都記得——讓我常懷疑自己記憶力這麼差，是否能做歷史研究。最精彩的應該是，不管學生問他什麼，他都能給予具體的回答，並提供史料方面的資訊，這也又讓我懷疑自己是否適合指導學生。他對臺灣歷史和地理的了解很驚人，有次拜訪王先生後，回到家忍不住告訴我先生：聽王先生講臺灣的史地，讓我覺得自己像個外國人！不過，王先生並不是那種「知識雜貨店」的類型——你要什麼就掏給你什麼；他的心智（mind）是學者的心智，知識是經過統整、歸納、分析之後而獲致的。這可能就是王先生自學成功的根柢所在，王先生在日本統治時期畢業於臺北師範學校，未曾受任何現代學術訓練，卻能憑自己的努力而治清代臺灣史——讀者須知，王先生從未正式學過中文！

王先生搬到臺北後，由於眼睛不好（兩眼都開過刀），加上帕金森症，已經無法繼續做研究了。但是他的心智還是很活躍，腦袋像個寶藏。除了帶同學去拜訪外，我幾度告訴王先生，如果他有什麼舊稿想整理的，我可以請學生替他做，但王先生有老一輩人的持守，不輕易給人添麻煩，沒表示任何需求。2007年臺灣文獻館和日本中京大學（經費來自日本財團）舉辦第六屆臺灣總督府文書學研習營，屬意在臺大本部舉行。由於我已轉到臺大教書，雙方單位希望透過我來申請臺大場地。我於是負責規劃場地和申請補助諸事（場地費後由曹永和文教基金會贊助）。藉著這個機會，我建議主辦單位邀請王世慶先生和曹永和先生參與，順利獲得同意。我在中研院曾和同事鍾淑敏教授一起舉辦「臺灣

總督府公文類纂研讀班」，研讀班經營多年，其間曾獲得王先生諸多指教，很佩服他對總督府檔案的了解和掌握。在幾次討論之後，王先生決定以「60年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保管、整理、編譯、運用和研究」為題，發表演說。當時他已經沒辦法寫講稿和看講稿了，他的演講全然仰賴「腹稿」，內容翔實，條理清晰，可以說將總督府檔案的60年來的流轉講得很透徹，私意認為，王先生之外大概無人有這樣全盤的認識。會後我覺得這篇演講稿若不整理出來，實在太可惜，於是安排臺大歷史所碩士生金柏全和施姍姍同學根據錄音帶整理，兩人先做成逐字稿，再請王先生校對。記得當時為了讓王先生容易校對，我們將字放大，用A3紙列印。

演講稿整理好之後，我想到總要找個地方發表，以廣流傳，於是我和王先生討論發表的園地。當時我手邊剛好有作者致贈的《臺北文獻》抽印本，感覺編排和印刷都不錯，就建議投到該雜誌社。我的想法很簡單，認為只要能刊登出來，就永遠存在，要利用的人就可以利用，哪個刊物刊登不是很重要。王先生為人很客氣，大概因為文稿整理等事都是我安排的，不好講什麼。但不久之後，好像是他主動打電話來（不復記憶），提到既然這篇文章是談臺灣總督府檔案，是否還是試投臺灣文獻館的刊物《臺灣文獻》？而且王先生說他一直在文獻會工作，好像還是投該刊比較好。我當時感到很不好意思，怎麼就沒考慮到這些？也就是在那個時候，我感覺王先生很念舊，他三進三出文獻會，有因學歷導致的委屈之處，但他還是處處以文獻會為優位思考。於是我和《臺灣文獻》編輯李榮聰先生聯絡；如果王先生念舊，文獻會的後進更是對他尊崇有加。文章順利刊於該刊第60卷第1期（2009/03/31），王先生收到稿費，在他的堅持下，分給了兩位同學。

王先生熟悉臺灣總督府檔案，「臺灣拓殖株式會社」（臺拓）檔案也是他第一個對外介紹的，但長期以來一直無法利用。中央研究院和臺灣省文獻會簽訂整理研究的合作計畫，中研院社科所和臺史所籌備處都有研究人員參與此一計畫。王先生掛名在社科所，我則掛名在臺史所。當時院內流行所謂的「跨學科合作」，我們和同院經濟學方面的同仁舉辦一場「臺灣資本主義發展學術研討會」（2001/12/27-28），

大家都提論文。那是兩天的會，曹永和先生和王先生都出席，經濟組同仁發表時，我看著兩位老人家從頭坐到尾，但輪到歷史組報告時，經濟組全員消失，不再出現。這件事讓我深刻感到所謂「跨學科研究」或「科際整合」在實踐上可能的虛幻性；另外，我也深感老一輩學者畢竟不一樣

（兩位先生是與會人士中最年長的），他們全程參加，而不是輪到自己發表時才出現，好像舞臺表演。

後來我們六篇歷史組的論文，在社科所擬出版的研討會專號（期刊）審查中，全軍覆沒；據了解是「跨學科」審查的結果。我當時拿到拙文的審查意見，沮喪在所難免，但也莫可如何，歷史論文送給經濟學者審查，當然很難過關。久而久之，我也差不多忘記這件事了。但是，王先生沒忘記這件事。有時聊天時，他會提到我們當時是和文獻會簽約，有將研究成果出版的義務，而且計畫用了很多經費，印象中王先生提到社科所還給他聘了一位助理。由於我早就不在意這篇慘遭扼殺的文章，任它沈在電腦中，聽聽就算了。有一天，王先生打電話給我，特地提到臺拓文章無法發表的事，他說：這是他第一次用公家錢影印。聽到這句話，我感覺背脊冒冷汗。

我想起我工作的單位，浪費公家資源的情況並不少見，有一次我發現一位助理正用影印卡大量影印數百頁的漫畫畫冊，再怎樣看都不應該是研究資料，於是要求那位助理讓我看他的影印卡，原來是國科會計畫的影印卡，他的「老闆」放他那裡，他拿來印自己的漫畫——只能說「絕對的資源，絕對的浪費」！好奇如我，很想問王先生：第一次用公家錢影印，到底確切的意思是什麼？第一次影印，還是第一次大量影印？不管如何，王先生的意思很清楚，因為用了公家資源，若研究成果無法出版，他覺得無法交代，為之很不安。他的不安，讓做事善拖的我決定「起而行」。於是我打電話和張炎憲先生商量，在他的大力協助



圖1 出訪印尼雅加達時合影，右起：王世慶先生、黃富三先生、曹永和先生、作者（1995年4月23日）。（照片提供：作者）

下，加上文獻館同仁的積極編排，《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論文集》終於在2008年12月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，以王先生的大作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土地投資與經營——以總督府出資之社有地為中心〉為首，共收有5篇論文。終於了卻王先生一樁掛心的事。

王先生那句讓我背脊冒冷汗的話，對我產生很大的影響，後來我用公費帶學生校外教學時，不嫌絮叨，總要叮嚀學生，我們用的是人民的納稅錢，不是自己賺來的——潛臺詞是要知所回報。老一輩人的操守，有些地方實在不是我們輕易學得來的。記得家父非常重視一些「小節」，例如不用公家信封寄私信，或拿來當別的用途。這看起來是小事，真要奉為圭臬可不容易。不善規劃如我，有時為了找一個可以用來寄私信的信封，折騰半天，還難免踰矩。家父長王先生一歲，1927年生（臺灣文化協會分裂那一年），他們有些言行舉止頗為相像，或許也算是一種世代印記吧。

2009年6月，王先生的身體大不如前，帕金森症越趨嚴重，走路變得很困難，但他還是答應我的邀請，到我當時教授的兩門課上各講一次課。一次是在臺大（2009/06/19），另一次在師大（2009/06/23）。我記得學生陪王先生搭乘計程車抵達臺大文學院後，拉來一張有輪子的辦公椅，讓王先生坐著，推他滑過長廊，進到教室來。臺大那一次，林蘭芳教授也來參加，後來由她、鄭麗榕和我將上課內容整理出來，刊載在「臺灣與海洋亞洲研究」部落格，後收入《臺灣與海洋亞洲研究通訊》第三期。當時臺北縣文化局正委託茱莉亞廣告傳播公司拍攝王先生的紀錄片，工作團隊特地到師大來拍王老師上



圖2 《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論文集》書影。



圖3 王世慶先生在師大講課後與學生合影。（2009年6月23日）

課的情況。師大那一次，王先生身體狀況比較差，我請他不要勉強，但他堅持來講課。我記得他下車後，腳抖得很厲害，步伐極細碎艱澀，後來學生借來輪椅，費了一番周折才將他推進教室。但是，當王先生坐定開始講課，他的神情非常投入、愉快，好像完全忘記身體的不適。講課的王先生是快樂的，聽課的我們何其幸運。



圖4 紀錄片拍攝後，王先生與臺大師生合影。（2009年8月12日）

為了協助文化局拍攝紀錄片，我動員學生「出外景」。我們陪王先生漫步大安森林公園、訪問母校沙崙國小和老家樹林，也在新生南路的寓所充當「臨時演員」。至今回想起來，感到是很珍貴的記憶，此時眼前浮現查忻和陳榮聲等同學推輪椅的鏡頭。當時王先生並沒坐輪椅，只有出門必須坐才坐。王先生曾表示想回母校臺北師範學校訪問，也就是現在的臺北教育大學。我到臺大教書後，其實很忙碌，有時實在擠不出時間來，後來看紀錄片試播，知道王先生有回母校，才放下懸念。王先生也很想重訪省文獻會，我也答應陪同他一起去，但路途遙遠，家人不放心，最後不得不放棄。



圖5 臺北縣沙崙國小校門前合影。左起：陳慧先、周婉窈、王世慶先生、孫女淳德、陳榮聲。（2009年8月25日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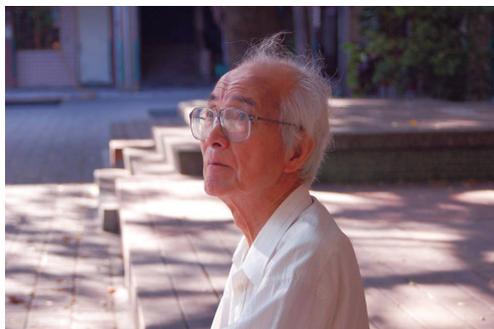


圖6 王世慶先生重訪沙崙國民小學時攝。（2009年8月25日）

王先生在新生南路的住處，上下兩層樓打通，有木梯連接，樓層坪數不大，客廳在5樓，起居間在4樓。王先生還能上下樓梯時，我們都是

在5樓客廳和他見面，後來他的病況嚴重後，就只能待在4樓。去年我和學生去祝壽，就是在4樓的小房間。不記得是哪一天了，總之，為了向王先生借舊照片翻拍（臺大口述歷史訪問委員於霧峰的合影），我去拜訪他。當時王先生已經不太能起床了，家人協助他下床，並「挾持」他坐到狹窄的甬道上的椅子上。我不清楚4樓的格局，好像都是臥房，甬道是唯一可會客的空間。此時王先生已經很孱弱，臉上表情有點苦澀。但是，當我問及照片的背景和人物時，他精神來了，開始娓娓道來，神情愉快，在略微昏黃的天光中，他的眼精發亮——炯炯的亮光。我被這種亮光所震懾，啊，這就是學者的心靈之光！知識是永遠的火把。

去年10月中，我正計畫比較有系統地訪問王先生，以便完成臺北縣文化局委託的王先生口述傳記的撰寫計畫。我在17日打電話給王先生，沒人接聽，心感不妙。第二天再打，王孟亮教授接電話，才得知王先生兩天前因跌倒而住院，由於腦部積血，即刻開刀。過幾天，我和林蘭芳、鄭麗榕到加護病房去探望，王先生沒睜開眼睛，我無法確知他是否知道我們來訪。王先生轉到普通病房後，我去探望，有一次剛好碰到王先生的夫人林麗月女士。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王師母。那一天，是我看過王先生狀況最好的一次。平常我用臺語（閩南語）和王先生交談，偶爾夾點日語。那天王師母和王先生講日語，我也湊上一腳，我們用日語替他打氣。王先生鼻孔插著餵食管，講話不方便，但當時頗努力講一些話，當然片語居多。王師母一再要王先生謝謝我來探望，所以王先生講了好幾次「arigatō」。後來王孟亮教授告訴我，即使在王先生似乎記憶錯亂或開天窗之際，對來訪者總不忘說「謝謝」和「再見」。用日本人的表達方式，這是「附身的教養」（身に着ける）。

我不是家人，當我去探望時，無法話家常。我選擇和王先生談學界的事，說「談」不準確，應該說是講給他聽。我自己擅自認為，這還是作為學者的他最關心的事。我告訴他，曹永和教授90壽慶研討會和新書發表會，也告訴他，我在人類學的研討會遇到吳燕和教授，「吳教授提到您呢。」我問說：「王先生，您記得吳燕和教授嗎？」無法講話的病人，點頭。有一次，我要離開時，如同往常，握住他的手說：「王

先生，我要回去了，下次再來看您。」我看到王先生眼眶發紅，泛著淚水，臉有點扭曲。離開病院時，夜色茫茫，下著小雨，我盯著計程車窗外往後飄逝的燈影，感覺人生真是一條寂寞的路。

看著生命力從你認識的人身上一點一點喪失，是很傷感的。王先生後來又送加護病房一次，再度轉出普通病房後，狀況好像愈來愈差。出院後家人將他安置在天恩安養院，就在新生南路靠近和平東路的地方，離我家可說再近不過了。我去探望時，感覺王先生好像已經不在那裡了。他住在3人房，一位房友看來病情有點嚴重，另一位則似乎沒怎樣，看見我來，還下床過來仔細端詳王先生，問說：「他怎麼了？」又問：「你是他的什麼人？」我如同平常，答稱「學生」，於是引來這位住客一連串問話，後來他就出去客廳看電視了。我看著鼻孔仍然插著餵食管的王先生，感到插管的苦，感到生命可能的極度無助感，原想再講些學界的事，再也講不出來。臨走時，我握住王先生被網套套住的手（印尼看護說他會拔掉身上其他的管，所以得套住），我說：「王先生，我回去了，下次再來看您。」那是我最後一次探望他。

成住壞空是佛教對自然和人世現象的歸納與覺悟。入世的人文學者容或接受個人生命的成住壞空，但對於精神層面的東西還是期待它能在傳承的接力賽中生生不息。除了對知識的熱愛，我在王先生身上也深刻體會到他對臺灣的摯愛，他一生以他獨特的方式奉獻於這塊土地和過去、現在以及未來生活於其上的人群。在追思王先生最後的身影和遺響時，我毋寧相信他希望我們傳承他的治學態度、奉公精神，以及對故鄉的愛。（照片提供：茱莉亞廣告傳播有限公司）（完稿於埃及人民力量革命成功的翌日，2011/02/12）